

“拨乱反正”

BOLUAN FANZHENG QINLIJI 亲历记

● 王彦民 编



人民出版社

“拨乱反正”

BOLUAN FANZHENG QINLIJI 亲历记

王彦民 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拨乱反正”亲历记/王彦民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

ISBN 978-7-01-009507-3

I. ①拨…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1976~1982

IV. ①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412 号

“拨乱反正”亲历记

“BOLUANFANZHENG”QINLI JI

王彦民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215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01-009507-3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目 录 —

1.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任仲夷等 1
2. 胡耀邦与“拨乱反正”	沈宝祥 12
3.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	宋任穷 28
4. 伟大的转折 历史的必然 ——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李德生 56
5. 伟大的历史转折	江渭清 67
6.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	万 里 72
7. 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	薛暮桥 80
8. 在“拨乱反正”中前进	张 震 87
9. 新的考验与挑战	洪学智 97
10. 教育部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	张承先 106
11.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 ——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	吉伟青 111
12. 为邓小平起草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始末	吴明瑜 118
13.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	陈 磊 127
14. 外交部的“拨乱反正”	黄 华 141
15. 忆述刘少奇“头号冤案”平反	王光美 145
16.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	温济泽 147

17. 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 戴 煌 157
18. 文联、文坛、文友及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王 蒙 164
19.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 浩 然 185
20. 这一天 马识途 188
21. 十年之后 韦君宜 191
22.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吴庆俊 200
23. 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 龚育之 210

——编后记——

226

1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任仲夷 钱其琛 刘导生 李 晨 缪俊杰 沈宝祥 朱德生

任仲夷（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总设计师小平当之无愧

我和邓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我记得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是最早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要。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和怎样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可能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央调我到广东工作。

在我到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和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决心很大，魄力很大。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虽然我与小平同志接触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但小平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他革命经历丰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非常了解并能把握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谋善断，举重若轻，作风果断；他讲解和回答问题非常明确、准确、简练、干脆；他善于把许多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

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要争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等等。他说的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干部，就是一般群众，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大都能背诵出来。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钱其琛（国务院原副总理）：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

1980年初秋，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就当时国内外注目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

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致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

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刘导生（中共北京市委原书记）：一次历史的转折

我调来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是1978年12月26日，当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拨乱反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很大进展，但北京市的工作落后于其他省市。由于当时的某些领导干部思想上受毒极深，仍然被“左”的思想、理论所禁锢，自觉不自觉地阻挠拨乱反正。而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纠正和清算“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两种思想已逐步形成尖锐的对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长期统治我们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左”的思想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服清醒剂。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我顶住了来自某些领导人的压力，于1979年3月上旬召集了北京各高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在讲话中指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北京市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我们北京市的工作要跟上中央的步伐，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目前的落后状态，迎头赶上。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提倡“三不主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会议不

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委终于决定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1979年9月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在主报告中摆出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等等，并在思想根源上作了分析和批驳。

解决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已达到迷信程度的情况下，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经过全党几年的努力，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认清和树立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使党的各方面工作稳步转到“四化”建设的轨道，这在北京市委党的建设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拨乱反正，使国家的发展走上正确道路，这种历史功绩永远不会磨灭。

李晨（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小平给知识分子“摘帽”

我于“文革”前担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刚刚一年多就赶上了“文革”，“靠边站”了。1971年，我被重新结合，到当时的市革委会文教组担任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了，教育战线是重灾区。特别是1971年，在“四人帮”控制下开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的《全教会纪要》抛出了“两个估计”，说“文革”前十七年，在教育战线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起了很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破坏力比“文革”初期的“打倒一切”还厉害。当时我到北京市的中小学看，课堂上乱哄哄，百分之七八十的门窗玻璃都被打碎了，桌椅板凳几乎没有完整的，许多学生不到校，或进校不带书包。到了1974年，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北京市开始普及高中，没有合格的教师，就层层拔，教学质量急剧下降。那时我们到农村去调查，一个高中学生对我们说，要给我们普及高中，得先把我们老师普及了，我们老师就是初中毕业。

当时学生中流传一个顺口溜，叫“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全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干不干都吃饭”。教师的思想状态是“痛心、伤心、寒心”，“欲教不能，欲罢不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一所中学的高一年级做了一个测试，506个学生在六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考察中，平均80分以上的只有6人，平均不及格的却占86%。在北京四中的一个高中班，竟然有一半人连英文26个字母都写不全！

1977年2月，北京市召开“文革”后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鼓励教师要敢抓教学，要敢管，初步整顿了教学秩序，但成效并不显著。

就在这时，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他自告奋勇抓教育，上来就抓了两条，一个是推翻“两个估计”，指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给广大教师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再一个是恢复高考制度。这两条一抓，教育战线的局面整个就变了。我记得当时商店里卖的练习本一下子就销光了，文具也脱销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都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小平同志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抓住要害，立即扭转了局面。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个全过程，感触甚深，至今记忆犹新。

缪俊杰（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著名评论家）：暴风雨般掌声响彻文代会

20世纪70年代末，我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大会上小平同志致

“祝辞”时获得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将长久留在中国人的“民间记忆”里。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是文艺界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同广大文艺工作者见面。人们当然会记得，1960年召开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后，文艺界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艺界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劫难，许多有杰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相继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或“黑帮”，受到打击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许多本来优秀的作品或正确的理论观点，被扣上“毒草”和“黑论”，受到批判清剿。经过十多年折腾，文艺界已经溃不成军了。改革开放之后召开的这次文代会，是文艺界一次重整旗鼓的大会。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文艺界致“祝辞”，就是代表党中央对文艺界作重新估价，也是来为文艺工作者鼓劲的，大家心里十分高兴。我记得，小平同志一走到讲台，全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此后，在小平同志的整个讲话里，全场一次次地响起热烈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塔斯社发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时，在每个段落之后都要用括号标明“掌声”、“热烈掌声”、“暴风雨般掌声”、“雷鸣般掌声”，来表现演讲效果。后来听说，有些是遵命作秀，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确实是一点不过分。我们在现场感到，那些掌声确实是真诚的、由衷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插曲。记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文代会是“对号入座”。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满头白发、身躯瘦小的长者。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位长者，只是觉得他有点“怪”。每次他都是找到位置就坐下，从不同人讲话，台上人作报告或发言时，他总是闭目养神，或伏案瞌睡，既不抬头，更不鼓掌。但我注意到，在小平同志讲话时，到关键处，他微微睁开眼睛，高兴地鼓起掌来。会下打听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沈从文长期被打入“冷宫”，他对文坛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经过那么多世事磨难，几乎心如死水的沈先生，听到小平同志的讲

话，也高兴地鼓了掌，我想，这是他由衷的掌声，不是敷衍，不是随大流，更不是任何人强迫的。沈先生的掌声可以代表文艺工作者的心声。我当时是作为代表而不是记者参会的，所以没有及时采访一下沈先生的感受，现在想起来是件憾事。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小平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给当时的党中央写信，他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国。5月3日，邓小平的这封信转发到全党县团级。当时，我们听了传达，大家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个人迷信仍然盛行，思想普遍僵化。邓小平的这封信，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胡耀邦同志两次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胡耀邦同志二次审稿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刊出后，5月11日《光明日报》就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就全文转载。但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的总编就接到权威人士的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旗”，政治上很坏很坏。当时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批评、指责这篇文章，给这场讨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详细摘要发表了小平的讲话。当时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大家都很兴奋。

7月23日，胡耀邦同志又通知我们去他家开会。那天天气很热，我们都坐在走廊里。耀邦同志很兴奋地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小平同志找他谈话，亲口对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

些书啊，是个好班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很快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通过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深感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德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拨乱反正开创了理论工作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是重灾区，北大哲学系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学生中，先后有三四百人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处理。在当年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大家兴奋了一下，但后来一段时间还是陷于沉闷，因为周围的环境变化并不大。后来有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才真正看到了新气象。

1978年底，我开始参与北大哲学系的领导工作。当时我们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教师、学生平反，落实政策。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党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不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是不可能让大家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向前走的。

我从195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此后一直留在北大哲学系工作。当年“反右”的时候，有一个罪名叫“抽象拥护、具体反对”，意思是说，虽然你也拥护党中央，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你反对基层单位某些领导者的做法，那么你就是“抽象拥护、具体反对”，就是反党，就可以把你划成“右派”。有的老师仅仅因为参与了农村调查，回来后说了几句“农村太穷”、“15年超英赶美目标不现实”之类的话，就被划为

“右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主导的拨乱反正推动下，经过大约一年多时间，受到不公正处理的知识分子都被落实了政策，压抑多年的积极性被释放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后来都为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记得当年有一个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临毕业的时候和我说了一句推心置腹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在大学学习三年，感到哲学系的教师特别像“芭蕾舞演员”，一个是转弯子转得特别快，一个是脚跟不着地。的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哲学系的教员十分不容易，必须时时刻刻跟着政治风向走，根本不可能脚踏实地做学问。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所谓“大辩论”里，一方只要找出了一句毛主席语录证明自己的观点，就算证明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取得辩论的胜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扭转了这种恶劣学风。小平同志后来南方视察谈话中，谈到不要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拨乱反正是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意义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感触至深。

（摘自 2004 年 8 月 9 日《北京日报》）

2 胡耀邦与“拨乱反正”

沈宝祥

拨乱反正，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和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很特殊的一页。这一段历史时间不长，但很重要。如果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就很难了解新中国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很难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先行者。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我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参与了拨乱反正的一些事。我已撰写了《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一文，着重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发表在《百年潮》2003年第7期上，现在写的是续篇，讲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回顾了粉碎“四人帮”时的一些情况。他说，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12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